
城市治理的中国实践及其经验

董慧¹

(华中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要】: 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全球化及城镇化, 使得整个城市和社会生活变得空前复杂。这需要发展一种更有效的城市治理能力, 更好地协调各方面的关系, 维护公平正义, 实现和谐社会的长治久安。在我国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期, 梳理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治理地区实践, 尝试呈现城市治理的空间和区域实践形态, 在此基础上整理治理的经验, 发掘治理的规律, 为新时代城市治理的实践助力, 无论是对于更公正的城市治理理论建构, 还是对于提升城市治理效能, 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 城市治理 正义 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F299.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8477 (2021) 11-0037-07

一、问题的提出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结晶, 城市治理是解决当前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 空间的迅速扩张、经济的发展衍生而来的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问题与城市问题。城市治理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不仅涉及城市的空间发展和人民生活、生活等各个方面, 也涉及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等各个环节。中国城市发展创造了世界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奇迹, 中国城市的现代化突出表现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人类文明实践上。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生活配套、通勤设施、公共空间、社会保障等不断提升与改善, 城市居民的满意度不断提升, 对城市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不断增强。可以说, 这些成就直接与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理念与实践措施紧密相关, 城市治理如何能在全面推进过程中, 进一步彰显内在的“善”“正义”和“美好”也将直接决定着中国现代化的未来。新时代既有城市的新发展和新空间, 也有新矛盾和新问题, 充分关注城市治理的中国实践, 对城市治理变革和实践所揭示出来的任务、方略、规律进行深入挖掘,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新格局, 提升城市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建设和治理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

二、城市治理的地区实践

伴随着人类文明进程的持续推进, 城市逐渐发展为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 成为人们生产、生活、交往的中心。尽管每一个国家的制度和文化的都有自己的特点, 现代化进程有快有慢, 但对城市文明的繁荣、城市秩序的稳定、城市生活正义的追求与憧憬是人们共同的愿景。不同国家城市治理有不同的地区实践, 形成不同的治理模式和不同的治理经验。梳理中国有代表性的城市治理地区的实践, 总结城市治理的经验, 努力将有中国特色的城市治理的地区形态、实践特点呈现出来, 这也是对于城市演变规律、发展战略、治理经验的梳理和提炼。探讨由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全球化和国际化所推动的城市治理的实践进程, 是面向现代化新征程的城市治理的重要支撑。

上海: 精细化的城市治理。从一个重要的国企工业基地和工商业城市, 迈向正在崛起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全球城市, 从“宁

¹作者简介: 董慧 (1974-), 女, 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 2019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数据驱动地方治理现代化综合研究” (19ZDA113) 阶段性成果

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到浦东新区贡献上海全市 1/3 的 GDP，上海的城市面貌日新月异。2019 年上海获得全球智慧城市中国赛区城市精细化治理奖，¹代表上海经验在国际上被认可。这既是对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时所寄予的厚望——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积极落实，也表明上海正在探索出具有上海特色的城市治理之道，创造出超大城市治理的中国经验。上海市委市政府积极响应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调研，结合上海城市发展特点、相对优势，探索适应时代变化和上海特色的城市治理之道，在 2017 年推出第一个社会治理的五年计划，对如何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破解社会治理难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部署。认识到加强基层社区建设关系到上海的未来发展，将城市治理目标聚焦于社会最基本空间细胞“基层”——包括街道、社区、乡镇、农村，倾听市民呼声，关切和积极回应市民反映的突出问题，化解市民与市民之间、市民与政府、市民与社区组织等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形成稳定有序的城市氛围。在基层建设和治理方面，上海采取了许多有益措施，实现了一系列创新，稳定了城市社会治理的根基。积极推进整体性、系统性的综合治理工程——区域生态环境治理，各地区相继成立专门的管理领导小组，并且与相关职能部门和单位建立起不同的统筹协调、沟通督办的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为上海城市治理的发展指明了精细化管理的基本方向。精细化的城市治理，治理核心和主体以及服务的对象都是人，应该用精准的治理方式、手段、工具，精确地解决与人的需求紧密相关的城市设施、生产、生活、环境、风险管控等不同领域的问题，体现治理效果的功能性、层次性和细致性，使人们获得满意舒心、精巧精致的生活品质。精细治理意味着由粗放、粗糙、粗线条、大而化之的治理转向效率、准确、精准的治理，治理政策、制度和机制，需要梳理细致和细化，治理措施、技术、目标、效果要理性规划、精益求精。上海也正是依照上述治理内涵的逻辑要求，在千头万绪的城市问题及其治理中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精细化治理之路。比如“路长制”的方案，就是针对不同路段各自分割、孤立管理而建立的一个立体管治体系，紧扣精细化管理要求，建立起来的不同路段之间有机联系的精准监管机制。静安区的“路长制”，建立在信息化的“微网格”基础之上，成效突出，走出了一条城市网格管理精细化改革的特色实践路径。

北京：疏解首都功能的城市治理。北京作为首都，有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厚的资源、优厚的待遇，成为吸引人才的重要区域。快速的城市发展和大量人口的进入，引发了超过北京城市资源、环境、服务、人口容量的诸如交通、空气等问题的大城市病。这种城市病，从城市本身发展的表面逻辑来看，是因为北京作为“中心”的各种功能及影响效应，吸引了更多的人口，导致人口增长过快与资源有限之间的矛盾，加上人口分布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均衡束缚了城市进一步发展。这实际上给城市治理提出巨大挑战，即如何提升作为首都北京的城市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科学理性地规划，保障城市发展应有的规模和功能，使之与生态环境、资源服务的容量相匹配，并且保持合理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节奏，改善与服务民生。城市战略定位决定城市治理的走向，习总书记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为北京城市治理的中心、重心和核心给出了发展方向和实现目标。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北京城市治理走过了关键性的 5 年，不断迈向人们满意的和谐宜居之都。首都如何建设、如何发展不仅仅直接与北京市民的生活紧密相连，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聚焦的重大时代问题。北京的城市规划伴随着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发展，历经曲折复杂的阶段，从最初城市性质、城市建设标准的确立，到后来城市目标、功能的不断拓展与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多元并举发展，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城市建设体制的完善，总体而言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形成了具有首都特色的城市布局和基本构架，积累了颇具核心竞争力的城市发展经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城市治理和规划提出的重要遵循，是北京城市治理的核心要义，是城市规划的牛鼻子。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 年）中，“疏解非首都功能”出现了 21 次，可见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北京在长期发展中，承载了超出自身核心功能的众多功能，导致诸多大城市病。城市如同人类生命有机体，当吸入众多资源要素而没有得到消化，功能过多集聚而没有扩散与辐射的话，就会堵塞生病。所以，疏解就是要在明确定位首都核心功能即作为政治、文化、科技创新、国际交往中心的基础之上，将其他不属于首都的功能向外部疏导、疏散，以减轻北京城市功能的承载力，缓解城市发展压力，让北京变得更轻盈强壮，从而有充足的空间和力量去加强和提升其核心功能。这项系统性的治理工程，经京津冀三个地区共同进行了 5 年的高质量推进，在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方面取得了新的突破和成效：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交通一体化、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升级转移稳步推进。

广州：提升老城市新活力的城市治理。广州是一座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老城市。老城市，从时间维度上说，是指广州历史悠久，建城历史长达 2000 多年，这是历史文化的优势；从空间维度上说，空间生态与品质有待提升。老城市如何进行新治理，来激发活力，这是广州近几年城市治理实践的主旨与原则。作为一个多元、包容的城市，广州近几年的城市治理实践进行了很多创新，发生了巨大变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验，即致力于“提升老城市新活力”。新活力，则表现在城市治理的具体实践，城市创新

发展，力图提升经济竞争力、科技创新力、文化持久力、生态恢复力以及行政组织力，打造繁盛且温情、温暖的世界一线城市。城市环境、城市景观是观察一个城市是否具有活力，判别城市治理水平高低的重要窗口。广州市越秀区新河浦历史文化街区的复兴工程，在空间的规划与营造、景观环境的美化与改善、人居环境的提升与和谐、城市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上，展现出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独特经验与特色，也因此获得“2019 亚洲都市景观奖”，²这是广州城市治理在微空间改造与治理上的成效。新河浦街区的建设与治理，延续着广州城市更新的“微改造”模式，严格按照计划、规划与政策实行：在改造目标上强调街区的整体规划与历史文脉的保护，“活态保护，多规合一”的城市复兴与有机更新，打造老城市新活力的优质生活空间和创新发展空间；在改造主体上，强调居民共建共治共享，成立街区互助会，打破传统治理模式，主动与居民协商，听取居民建议，实现政府与居民共同治理；在改造方式上，强调保存历史元素和传统的建筑形式、空间结构、细节及动线，修缮提升，修旧如旧，并相应地植入文化艺术，培育创新的文化产业。传统的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思路，一般而言是简单的空间开发和拓展，大拆大建，商业化色彩浓烈，不断开辟新的土地来搞建设，注重量的增长。广州的微空间改造，则是一条守正创新的空间治理之道，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提升，转向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内涵发展。这样一种微空间治理实践，能够激发并且整合传统与现代、自然与人文、市场与组织的力量，实现老旧历史街区社区的劣势转化，在生态环境改造、民生服务、优化商业布局、社区综合治理以及东山品牌打造这几个紧密关联相互影响的方面，创造了一个可持续性、艺术性、安全性、和谐性的独特的空间格局和体系，形成了更好的、更让人们感到幸福的温情城市。

三、城市治理的中国经验

党的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和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系统阐释城市治理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关键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规划建议》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绘制了宏伟蓝图，也为城市现代化的未来实践明确了方向。为此我们需要对城市治理的中国实践进行经验总结，并在此基础之上，深入理解“十四五”时期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深刻内涵，这对于我国在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下更有效地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具有基础性和重要性意义。

（一）以人民性作为城市治理的价值原点。

城市发展具有人民性的内在要求，城市发展惠及的不仅仅是先来后到的问题，更是共同富裕的问题，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即已提出“共同富裕”问题，需要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这也是人民城市的共富原则。城市治理的人民性，实质上意味着更多的人在城市中寻求更好的生活，应该尊重他们的理想，保证他们的权利，促成美好生活的实现。城市的人民性是城市治理人民性的基础，也是城市美好生活的基石，这也是新时代城市治理的新要义。这种新要义对当前乃至以后中国及世界城市治理具有积极作用。上海的城市治理，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经历了从管控式管理到有机系统式治理的转变历程，成为超大城市治理实践的成功典型，走在全国和世界的前列。究其原因，是因为上海围绕“人”为核心，用“绣花针”为市民绣出更功能化、美观化、人性化、细节化的城市生活环境，给市民更多红利和美好感受。

无论是在人口管理、公共服务、街道和社区体制，还是顶层设计、政府建设、市民参与、安全保障、风险化解，抑或是基层社区治理、垃圾分类、居住空间规划建设、城市交通运行布局、公共空间资源配置、生态环境整治等方面，都可以看到城市治理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价值目标，始终将人民性作为城市治理的价值原点、目标和归宿，关注人民的需求和利益、权利和福祉。现代城市中大量汽车尾气、工业废气的排放，建筑工地、道路施工的扬尘等，打破了人与生态之间的平衡和谐关系，给城市中人们的生活和健康带来极大危害。因此，积极进行城市大气污染治理，保护生态环境，成为城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坚决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致力于提升人民的蓝天幸福感，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为如何治理北京大气污染指明的方向，³采取多种有力措施来治理首都的空气病。2019 年 3 月 9 日联合国发布的《北京二十年大气污染治理历程与展望》评估报告中指出，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1998—2017 年这 20 年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也是寻求美好空气质量的过程，因为有明确

的目标、全面的计划、科学的方法、全民的参与，在大气污染全面综合治理上打赢了难度非常高的攻坚战，形成了对其他国家大气污染治理具有可借鉴价值和宝贵经验的北京特色。

（二）以智能化作为城市治理的助推力量。

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智能化成为创新城市治理最重要的手段和载体，智能化成为促进和实现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助推力量。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5G 等新技术的应用，不断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当人们感叹未来的同时，城市治理也已步入网络化、信息化、智能化的发展时代。新时代的新特点——数据化、信息化、智能化，使城市治理的内涵、手段与模式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1](p49)}也就是我们通过治理的社会化普及、法治化保障、智能化便捷来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社会。“智”主要指技术维度的智能化，包括城市治理的智能感知、智能计算、智能预测、智能决策与智能服务。“智”指向城市运行的巨大动力和活力，技术智能化是城市现代化治理的重要工具与条件，也代表着城市发展的文明程度。它要求我们在技术上不断精进，尽可能全面利用好大数据、云计算等资源，最大限度地打造城市信息化及其应用，运用数字信息技术及智能化技术汇集、了解老百姓生活的日常需要和问题，为老百姓提供便利美好的智能生活。

智能化既表现在城市的数字化建设上，海量数据为城市管理者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提供了资源，政府信息公开为公众的信任、对政府数据的利用进而激发其参与治理的热情奠定了基础；也表现在城市交通、公共安全、医疗卫生等丰富的应用场景中大数据不断地被拓展，形成整合性的、自动性的、主动性的智能化数据，开发出智能化的解决方案。“科学运筹城市三元空间，巧妙汇聚城市市民、企业和政府智慧，深化调度城市综合资源，优化发展城市经济、建设和管理，持续提高城市发展与市民生活水平，更好地服务市民当前与未来。”^[2]信息技术的发展是智能的重要支撑，智能城市的重要基础在今天主要表现为人工智能，智能城市突破了传统产业和生活的二元关系，关注公共服务在内的三元空间关系，主要面向城市建设、城市公共服务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智能化。相应形成的治理模式是“需要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等多元主体携手合作、共同参与，从而构建多层次、多样性的 AI 治理模式”。^{[3](p14)}我们可以将 AI 时代的治理模式，看作是治理理念的最新实践指向。那么 AI 治理模式在城市治理中的实践，就是将城市发展的各项内容都通过大数据的形式进行收集、处理和分析。大数据中“大”主要是指数据覆盖的全面性和多样性，然后根据数据显示出的样态，进行针对性的问题解决，有效地推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运营等生命周期的智能化和智慧化。数字化为智能化提供基础资料的支撑，智能化则为智慧城市提供功能性方面的支持，只有以人为中心的智慧化才能真正彰显现代城市治理的本质性目的。

（三）以高质量发展作为城市治理的内涵要求。

完善与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能力和水平，创造市民满意的高品质城市生活，离不开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改革走向纵深和拓展的重要条件，也是一流城市治理的重要内涵。高质量发展，既需要体现增量的发展，更需要体现质量改善、提升的发展。我国在城市治理高质量发展方向上探索出独具特色的模式，尤其表现在城市群的治理上。城市群是城市化发展到一个成熟和高级阶段所出现的城市空间组织形式，是多个城市高度一体化的产物。一体化的城市群建设，需要有区域性的治理模式，才能形成城市群体的合力。这种治理突出表现在以高质量发展为动力和内涵，高质量代表着国家经济、产业、人口、财富的高质量，代表着城市空间活力与竞争力。如广州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坚定不移地走高质量发展道路。城市治理实践中，经济增长、国土空间规划、产业结构布局调整与优化、民生服务的改善与提高、政府管理创新等方面表现出新活力。在城市群高质量治理中，协调、整体的共治理念尤为重要，它是战略性的顶层规划，也是城市群崛起的核心驱动力。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唯一的世界级湾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成果，代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群发展道路。

粤港澳大湾区孕育于珠三角城市群，但又超越珠三角的空间格局与发展阶段，它联通“两种制度”、多个国家，以多元、开放、活力、创新的新时代治理理念，成为带动我国东南沿海、辐射东南亚各国发展的高速引擎，用独特的发展模式和治理方式诠释

释着世界级城市群治理的中国特色和实践经验。高质量，是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撑的高质量。城市群的治理，发挥着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提升了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能力，全力打造国际科创高地。并且注重大力发展互联网产业、智能制造业、文化创意产业、新型金融产业、现代物流产业、新材料产业等支柱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超前部署大健康产业、航空航天产业、人工智能产业等未来产业，建设全球领先的世界级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发挥大湾区科技创新成果快速转化的优势。高质量，也是保障人的生存、提升人的发展的高质量问题。大湾区区域治理的本质是以一种共同体的形式为湾区内的居民提供更好的生存环境、发展条件，从而带动湾区周边人民发展。城市群的治理最根本的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构建命运与共、共建共享的命运共同体。

四、城市治理的未来展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1](p6)}为了在新时代下更好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势，实现城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满足城市居民对更加广泛的美好生活需要，我们党明确指出要努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城市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经济发展、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手段，担负着“让生活更美好”的动力支撑作用。实践没有止境。

基于新的历史方位和城市治理面临的现实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深化城市治理变革，优化城市治理实践水平，更好地完成城市治理体系与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转型任务。城市治理实践道路的探索，最终是为了满足人民更加广泛的美好生活需要，其中作为城市居民的人、社会组织以及政府的治理角色及实践仍存在一些不足。比如：城市居民参与城市治理实践的水平仍然十分有限，表现在城市居民被动式地参与城市治理，城市居民仍然习惯性地城市治理工作当作政府的内部职责，把基层社区（如居委会）当作一个与自己无关的工作场所，只有在生活过程中出现问题需要社区帮忙时才会想到社区的存在；城市居民非政治性地参与城市治理，对于物业管理、文体娱乐、环境整治、爱心捐赠等一般性治理参与较多，但对于涉及城市治理现代化的关键领域，诸如如何实行精细化城市治理等治理参与，则较少发挥作用；从整体上来看，社会组织作为独立于政府部门之外具有公益性质的非政府组织，日益成为城市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的重要载体，实现城市治理实践科学性的重要力量，但存在内部管理无秩序、资金来源单一、人才吸引力不足等困境，因而尚且无法满足新时代城市治理现代化转型对社会组织的新要求，制约着社会组织参与效能的发挥；政府机关在城市治理中的实践能力有待深化，新型治理理念落实不全面对政府治理人本主义价值观的实现造成制约，政府治理权责划分不清、法治化建设仍显不足等问题也对城市治理现代化造成阻碍。为此我们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积极探索创新路径：

第一，推动城市居民广泛参与，培育居民积极主动的治理参与意识。目前城市居民参与治理的现实难题主要表现为：参与治理形式被动化、参与治理内容非政治化、参与治理渠道单一化等。针对城市居民的被动式参与形式现状，我国相关部门可通过系列爱国主义教育，始终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41](p160)}增强城市居民的主动深入参与治理的意识，增强城市主体的责任与主动参与意识，认识到主动参与城市治理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自身美好生活的需要，并在主动参与中激发城市主体的潜在的自我组织、自我服务与自我发展能力；针对城市居民参与城市治理非政治化的内容表现，可制定操作性较强的城市居民参与治理的制度法规，以制度形式保障城市居民参与治理实践内容的多元性，提高城市治理参与水平与质量；针对城市居民参与城市治理渠道单一性的现实状况，可开发易操作的城市治理智慧参与平台，拓宽城市居民参与治理的渠道。政府在发挥主导作用的基础上，可发挥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通信技术，通过构建各部门协同治理信息共享平台等方式保障城市居民治理参与的多元化、多层次、高水平，通过扁平化的信息交流、开放共享、交往合作等形式凝聚民心民智民力，听取、吸纳民意，最大程度地动员其他城市主体参与到治理进程中来，以此推动和提高城市治理决策水平。

第二，提升社会组织参与能力，激发城市治理活力。当前社会组织参与治理实践的现实难题主要表现为：内部结构混乱限制参与治理的效率与水平、社会力量发力不足、参与治理专业性不强。为此，可通过构建以章程为核心的内部治理结构，通过完善的工作制度，明确管理人员至基层职工的职责划分、办事流程，防止财务失真、负责人权力过分集中、权责分工不明晰等内部治理混乱局面的出现，积极提升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有效性。

相关部门可通过政策资金扶持等形式，加大社会组织参与治理可行性与科学性的宣传力度，构建社区居委会与社区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治理制度，提升基层社区与社会组织的协作治理能力等，努力整合各种力量资源，形成城市治理各要素的协同发力。另外，可通过高校、专业培训班、社区专题辅导各类教育部门，构建专业、系统的社会组织专业人员的培养，采用社会组织工作人员的国家统一招募，完善社会组织专业工作队伍建设，从源头上改革社会组织的专业化问题，提高城市治理的专业化水平。

第三，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提高城市治理的规范化、法治化、专业化水平。我国一贯重视城市治理的法治化，但现阶段法治化建设需继续完善。目前，我国城市治理法治化问题主要表现在立法体系不完善与执法力度不严层面。2015年，我国虽然制定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城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但却并没有国家层面的、纲要性的相关立法，导致各级地方城市在制定城市管理法时缺乏有效的法律依据。数字化信息平台滞后导致的城市治理实践的粗放型问题。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暴露了我国数字化智慧城市平台建设的滞后性与问题。我国各级政府部门虽然意识到智慧平台建设的重要性，但是在平台的运行程序以及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上仍存在较多问题，城市治理实践的应急水平有待提升。例如基层治理人员在执法过程中要历经向上级汇报、申请执行等复杂的流程，造成城市问题解决的滞后性。

对此，各级政府部门可继续加强对下级部门进行理论宣传与灌输，保证新型城市治理理念的入心、入脑、入行，广泛吸纳民意，深化城市治理主体间的互动，激发社会活力，在充分发挥政府、公众、市场、社会组织等城市主体的多元参与、协同共治的基础上，不断引导企业、高校、医院、志愿者等更多主体参与到城市治理的进程中来，全面提升城市治理理念的贯彻。借助数字化与智能化实现城市治理的精细。借助大数据技术、新媒体等互联网平台构建精细化智能管理平台，将其横向全面贯彻到城市治理的旅游、教育、卫生、交通等各个方面，纵向全面贯彻到中央、省、市、县、社区基层等各个层次。

完善网格化服务管理体制，将其在服务、管理、监督等各个领域普及，提高基层互联网普及率。建立健全权责清晰的问责机制，增加社会评价配套机制，确定清晰的治理边界，进而改善地方、基层城市治理范围交织的现实难题，更加清晰地界定城市治理相关部门的责任边界。此外，注重城市治理的法治化建设，各级政府应该坚持立法先行观念，通过确立纲要性的城市治理相关法律，继而在落实立法精神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城市治理法律体系：通过培训、教育、宣传等方式，向城市治理多元主体普及法律知识，尤其提高基层社区工作人员的法治思维，并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坚持各项事务依法办理与解决，使市民做到学法、守法、用法；可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做到各级政府、群众、媒体等多元监督，同时加强对人工智能制造者、使用者、软件和数据等技术部门运行的监督，完善执法程序的透明度以及公开度。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2] “中国智能城市建设与推进战略研究”重大咨询研究项目组. 我国应制定“城市智能化 2025”专项发展规划[N]. 科技日报, 2015-09-16(008).

[3] 庞金友. AI 治理: 人工智能时代的秩序困境与治理原则[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8, (10).

[4]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注释:

1 上海大数据应用创新工程项目“大数据与城市精细化管理(静安)”项目(以下简称:上海静安“151项目”)获得在西班牙

牙巴塞罗那举办的 2019 全球智慧城市大会中国赛区“城市精细化治理奖”。此项目由上海联数物联网有限公司及上海数据交易中心牵头建设。静安区治理成为全球的样板和标杆。

2 “亚洲都市景观奖”，是亚洲地区人文景观营造领域、亚洲城市建设的最高奖项，由联合国人居署牵头于 2010 年创设。在中国赛区包括：城市有机更新、城市公共空间、城乡环境治理、城市文化复兴以及美丽乡村营造这 5 个方面的单项奖。

3 参考“加大大气污染治理力度，应对雾霾污染、改善空气质量的首要任务是控制 PM2.5，要从压减燃煤、严格控车、调整产业、强化管理、联防联控、依法治理等方面采取重大举措。”见习近平在北京考察就建设首善之区提五点要求，载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2/26/c_119519301.htm。